

【发表论文】

# 传统与创制：19 世纪后期中国的洋务运动

郭卫东（北京大学）

中英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事件，中华传统的古典文明在此遇到了空前挑战。此前，中华文明代有变迁，但主要地还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整合，即便是受异域的影响，也主要是东方文明（如印度的佛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唐朝时期的景教也不过是属于基督教异端的东方教会），西方文明的影响多是间接微末。此后，在中西两大文明的交冲对撞之下，传统与创制成为这一时代的两大主题：一方面，中华传统文明发生嬗变，其中的某些部分出现了变异和式微，中华文明中更多地容纳吸取了其它文明体系特别是西方文明体系的内容，中华文明更紧密地与世界其它文明体系相融合；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明的某些成分仍然在生生不息地传承着，中华文明仍然有着自己民族的特色。其间，19 世纪后期中国的洋务运动是社会转型的关键。人们常说，洋务运动时期是器物层面变动的时期，戊戌维新时期（也有说成是五四运动前后）是文化变动的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是制度变化的时期，并不尽然。三个领域难以割裂，均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

## 一 制器

1840 年 6 月 21 日，英国东方远征军抵达广州珠江口外，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其因何在？时人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器不如人”。故而，鸦片战后，时代先觉者们提出的挽救国势的第一方略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长技”者，主要是指技术和器物。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有何不适，欠缺的只在技术领域，“该夷人除炮火以外，一无长技”<sup>1</sup>，这便是中国官绅对西方文明的早期认识。届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出逃，圆明园被烧。奇耻大辱之中的无助和无奈，更加剧了朝野间对“技不如人”的深切体认。到 19 世纪 60 年代，在中华文明的原有体系中注入西方的物质文明（洋器）渐成某些当权人物的共识。曾国藩把购买外洋船炮看作是挽救时局的“第一要务”。李鸿章也认为：“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sup>2</sup>。在这些开明者的推动下，被目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由而发轫。

以“自强”为要旨的洋务运动首先是从军事起步。自 19 世纪 60 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装备西式武器采用西法教练的陆军—湘军、淮军；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海军—北洋、南洋水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近代舰船制造厂—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侧重于军事的近代通讯设施—津沪电报线、天津电报总局。对西方文明的引进效法，不是从其它方面，而从兵工肇始。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很大程度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年版，第 122 页。

2 宝璠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3476 页。

上是由军事所牵动，近代化的改革也多从军事改革开始，这几乎成了整个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军事改革往往要比其它方面的改革快一拍（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即已开始从事军事工业，而民用工业的创办迟至70年代后；其它方面的改革又每每由军事改革所引发（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机器生产体系，由此引发民用工业的创建；办军队需要钱，由此引发财政改革和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练兵需先连将，由此引发近代军事教育的创办；办新式军队需要学习西方，由此引发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变化；等等）。

19世纪60至90年代中期的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历历可述。

近代大机器工业是一成龙配套的体系，制造舰船枪炮需要机器，制造机器需要钢铁，冶炼钢铁需要煤铁矿，煤铁矿开采后需要运输，制造业、钢铁业、采矿业、运输业、动力业互成流程诸环节，缺一不可。中国的近代运输体系也伴随着铁路的兴修开始搭建，然起步很是蹒跚，1873年，英国兰逊—瑞碧公司以祝贺同治皇帝婚礼为名，提出送一条“婚礼铁路”给清朝，被拒绝。但近代文明发展的势头毕竟难以阻遏，1878年，李鸿章创办唐山开平煤矿，为便于运输，修筑小铁路，担心引起民愤，最初用马车做牵引动力，继改用小机关车；直到1886年才扩筑路轨，轨距四尺八寸半，成为中国铁路轨道的定例，并使用机车牵引。到甲午战前，中国已铺设了由天津经大沽、滦州、并延伸到关外的铁路，全长705里。印刷业的进步也颇引人瞩目，1798年，捷克发明家塞尼费尔德发明了石印术，在鸦片战前已传入广州，而影响较大的是由《申报》馆主英国商人美查(E. Major)在华办的点石斋石印局，他于1884年5月在上海创办《点石斋画报》，在其后的20年间风靡中国。西洋石印较中式木刻优点很多，1883年，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写道：“西国石板，磨平如境，以电镜映象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书不难竟日而成就，细如牛毛，明如犀角。”而几乎与石印技术同时出现的中文铅印术更与现当代的中国印刷术直接相联系。石印和铅印术的采用，使书籍报刊的快速批量印制成为可能，且大大降低了印刷费用，为文化书籍的普及化平民化创造了更优越的条件。在商人赚取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文化的下移和空前的传播。

近代市政建设开始起步，1867年，“上海水龙公所”成立，是为中国的第一支城市专业消防队；1881年，英国人在上海开办了自来水公司，都市人不可须臾缺离的饮用水变得更为洁净方便；1886年，上海开始铺设地下水管，街区污水横流状况淡去。1882年，上海街市出现了中国最早的15盏弧光电灯，“创议之初，华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将遭电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后以试办无害，其禁乃开”<sup>3</sup>。这年夏天，电话（时以英文译音称“德律风”）也在沪滨展示。

中国人的消费结构也有了重要变化。开埠以后，价廉、物美、耐用的舶来品以不容阻挡的势头侵夺着传统土货的固有市场。1850年，上海的洋货进口总值为390.8万元，1860年就达到3667.9万元，剧增9倍多<sup>4</sup>。1899年，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开创人内藤湖南到中国北方游历，在北京往张家口途中的南口小镇所见：“南口旅店竟然有西洋式浴盆，以稚拙笔法写道Bathroom，并具备西洋便器，可知一路外国游客之多，亦足知英国人之感化，不可小看”<sup>5</sup>。趋新、求异、逐洋成为时尚，洋货成为人群追逐的对象。服装是人类生活文明变迁的一项具体而微又极其外在极易察辨的指标特征，中国传统的宽袍阔袖的衣着日渐被更合身特别是更适宜工厂劳作的服饰所替代。在城市人中，“西服”“西饰”的影响更为明显，天津卫的“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袴，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

---

3 徐珂辑：《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38页。

4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14页。

5 内藤湖南、青木正二：《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王青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sup>6</sup>。上海滩的时髦派，“女界所不可少的东西：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百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幅，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再说男子不可少的东西：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幅，洋泾话几句”<sup>7</sup>。此等人的穿戴配饰主要不是来自左近城乡，而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欧洲美洲，他们已具“世界公民”的形象。消费生活逐步打破了封建等级制的约束，而表现出个性化、大众化和西洋化的特征，尤其是崇洋成为近代消费的重要基调<sup>8</sup>。

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的是城市化，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近代城市化的浪潮。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决定性发展，城市更多的由以政治统治中心为主的各自独立缺少联系的传统模型向以经济贸易为主的网络联结的近代模型嬗变，城市前所未有的在经济上取得了对愈来愈多的农村地区的支配地位，开始出现所谓“铜山东崩，洛钟西应”的经济现象，就是农村听命于城市，小城镇听命于大城市，大城市听命于通商大埠，通商大埠又听命于世界各大商场的状况，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初动。并逐步形成了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和华北地区三大市镇密集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城市带的崛起。1843年开埠前，上海县的人口只有50万，充其量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非但不能与南京（1852年为90万人口）、杭州（鸦片战争前夕为60万人口）相比，到了1862年，上海仅市区的人口就已达300万。一跃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特大都市。<sup>9</sup>1893年，中国除台湾和东北以外的地区已拥有市镇中心1779个，城市人口达23513000人，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sup>10</sup>总之，经过三几十年的“同光新政”，中国的国力有了大幅提升。但仅仅器物层面是不够的，器物层面的变化必将引出其他领域的变化，中国不仅仅是“器不如人”，很大程度上还有“人不如人”，在封建传统的桎梏下，人们的精神受到压抑，人们的才智难以充分发挥，人们的素质难有迅速提高，而这绝非只靠技术改革所能解决。中国的近代化改革遂尔向更宽广的方向转进。

## 二 文化

鸦片战后，西学全面东渐。这一过程是缓慢的，又是持续和深刻的。西学首先在某些思想敏锐的人群中产生反应，这些人身份各异，却大都有文化人的背景，正所谓“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sup>11</sup>士子们所措意的自然首先在文化的领域，鸦片战时和战后的一段时间，士子对西方的认识停留在一些混沌的表象中。表现在，一方面是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自我本体认识的局限。无论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还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姚莹的《康輶纪行》。尽管这些著述是最早的一批由国人自撰的介绍西方状况的开山作而显得弥足珍贵，但这些著述在介绍西方时仍显得相当的浮浅和零碎，因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毕竟太有限，这些著述只得不得而采取主要是摘引的办法来构建自己的体例，魏源把这种方法称为“以西洋谭西洋”，<sup>12</sup>功夫主要用在翻译和编排上。上述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们又是再

---

6 张焘：《津门杂记》卷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7 《西装叹》，《申报》，1912年4月22日。

8 谯珊：《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载《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

9 《北华捷报》，1862年2月21日，1863年3月12日。

10 [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4页。

1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12 魏源：《海国图志》（大西洋）卷三十九（原叙），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校注本。

度转译的倒手，缺漏谬误自然难免。

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引起较大反响是从“西教”开始。19世纪50年代前后，西教首先在一些处在社会下层的文人和民众中发生效力，进而掀动一场社会风暴——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1814—1864年），自认被“天父”上帝认作“真命天子”，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这批被陆续请到人间的基督世界的领袖们将“拜上帝教”定为国教，信奉上帝无处不在的圣典。1851年初，“拜上帝会”——这支西方宗教与中国农民相结合的奇异队伍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3月19日，50万太平军攻占南京，改称“天京”。洪秀全这样一个连秀才都考不上的落魄书生，借助一些他自己也不能完全领会的西方宗教，因缘乘势，建立起了一个与清政府绝然相对的新政权。这个政权在坚持了十余年后，终因西教在中国缺乏广阔的土壤而失败。

洋务派们对“西教”、“西政”并不感兴趣，他们对西洋文明引介的兴奋点多停留在“西器”、“西技”的层面。但洋务运动并未止步于器物层面，而引入了西学和西方文化，开始建立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各门类。在教育领域，中国近代型的新式学堂最早由西人创办，到1860年，基督新教在华办的各类学校不下50所，天主教的学校缺乏统计，估计不应少于新教的数目。国人自办新式学堂始于洋务派，主要有三类，一是同文馆之类的语言学校，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办，学习外语等；二是军事学校，1866年左宗棠在马尾建立求是堂艺局，是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堂，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第一所陆军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开创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三是附属于某一企业的专业训练性质的简易学堂。洋务时期出现中国最早的官办的近代学堂不少于30所。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开始派遣留学生，有这样一些批次：留美幼童，从1872到1875年先后共派出四批120人；陆军，1876年有学生7人赴德学习；海军，1877到1885年有77人到法国和英国学习海军。在报刊领域：近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也首先是由外人涉足。1822年9月12日，天主教会在澳门创刊《蜜蜂华报》，是第一份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外文报刊。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有12份报纸，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地区。新思想需要新载体，新议论助长新媒介，两者相得易彰。

在学科领域：中古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传统知识谱系具有笼统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一经、史、子、集似乎能网尽天下所有知识。但随着科学发展和知识积累，各学科开始与近代劳动分工的细密化、专门化相匹配，近代的学科谱系也出现了分类化、专业化。这一分科过程首先是从西方开始。近代以降，随着国人对科学技术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深感中国传统的“门类不分，粗细不辨”的旧学难以包容适应新学的发展。依据西方的知识谱系重构中国学问已经势在必行。1862年设办的“京师同文馆”在1867年时开设的课程除英、法、俄等外语以外，还有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外国史地等。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的近代体系于中国的构建也是在洋务运动前后开始。生物学：1858年，《植物学》(Elements of Botany)出版，该书原本是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ohn Lindley)的著作，由英国来华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同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1811—1882年)合作节译而出，该书首次向中国人展布了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发现的植物细胞学说，揭示了在近代实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关植物体各器官的生理功能的理论，介绍了地球上不同纬度的植物分布情况以及近代植物分类学。其中“植物学”(botany)和植物分类单位的“科”(family)等术语便由该书首创。<sup>13</sup>化学：18和19世纪之交，出现了元素论和原子论两个奠定近代化学的基石，19世纪后半期，又在西方逐步建立起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与物理化学四大分支学科，近代化学面貌初备。1867年京师同文馆已开始教授化学课程；1880年，上海格致书院以中国科学家徐寿和传教士傅兰雅合作译出的《化学鉴原》等书为教材，讲授化学知识，进行化学演示。徐寿还首次译定

---

13 汪子春：《我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90—96页。

了碘、钡、锰等 24 个化学元素名称。医学：西医的引进中华在明清之际通过耶稣会士之手就已开始，其后，不绝如缕。地学：地学研究在中国有古老传统，也是最早与西学沟通的学科。但那还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学，并且主要是在地学两大分支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前一学科领域中进行。1872 年，中国近代早期科学家华蘅芳翻译出版了两本在中国地学领域具有开山性质的书籍：赖伊尔的《地质学纲要》（以《地学浅释》的中译名出版）和美国人丹纳(J. D. Dana)的《矿物手册》。1896 年，邹代钧等人在武昌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地理学研究机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公会章程称：“天下有志舆地学者，均可入社相切磋”<sup>14</sup>。这一切表明，洋务运动开展后，不仅出现了自然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的大面积“移植”，且引出了中国固有学科门类的改造和重构，并进入到对中国文化进行自觉反思的所谓“道在反求”的境界<sup>15</sup>；更重要的是，它使“西学”开始有机地系统地融进“中学”之中，而创造出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近代“新学”，中西学术被初步整合在一个新的学术框架中。

### 三 制度

宪政制度：中国人对西方近代政体的早期理解主要在三个方面：国会制度，宪法体系，责任内阁，统而言之，就是宪政思想。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近代对西方宪政思想的引介并不是一揽子进行，而是在内容上有先后，在时间上不同步。最早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是国会思想。19 世纪 40 年代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最早着墨于西方的议会制度。其中对英国国会的介绍：“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Parliament 议会音译）会议”。对美国国会的介绍最为详细：“设立衮额里士衙门（Congress 议院音译）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Senate 参院音译），一曰里勃里先好司（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院音译）”。凡经济贸易、赋税征收、法律词讼、军国重事等等，都必须由两院“议允施行”。<sup>16</sup>到洋务运动时期，议会思想得到更广泛地传播。1884 年，除了朝野一般性的鼓吹之外，甚至出现了官员向朝廷的直接上折建言。这年，编修崔国因向朝廷奏上请设议院的附片；能量更大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其遗折中也提出了设议院的建议。<sup>17</sup>有意思的是，议会宪法这些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合而为一的事体，在中国却有了离析。与议会思想率先传入形成某种反差的是，宪法思想的传入却略晚近。国人对宪政思想的理解首先从议会制度起步，而不识宪法，大概是因为议院为具象，较易认识，而宪法较抽象，认识较难；更因为宪法较之议会对君权具有一种根本大法的约束，更强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至上”、“制宪”、“违宪”等内容的法律化、制度化、神圣化，在专制政体板结的时代尤难传播。据考，在 1895 年之前，还绝少有人提出宪法问题。被认为在中国最早提出该问题的是早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他在 1895 年所作的《与陈次亮（陈炽）部郎书》中把“开国会，定宪法”作为救国的主要方略提出<sup>18</sup>。同一时期提出的《治安五策》的最末一项也是“定宪法”。在其诗中还反复鼓吹：“议院固宜设，宪法亦须编”；“宪法不行专制严，官吏权重民太贱，妄谈国政罪重科，上下隔阂人心涣。”<sup>19</sup>

---

14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年版，第 76 页。

15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0 页。

16 魏源：《海国图志》卷六十。

17 孔祥吉：《清廷关于设立议院的最早争论》，《光明日报》，1988 年 8 月 24 日。

18 《郑观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60 页。

19 侯宜杰：《关于首倡君主立宪者之我见》，《文史哲》1889 年第 5 期，第 50—53 页。

军事制度：大而言之，清代军事因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咸丰以前的八旗、绿营；咸、同年间的湘军、淮军；甲午特别是庚子年后推广的新军。而以后两阶段为中国近代军事制度的初步定型期。财政制度：清朝的财政体制，从顺治朝初立，到雍正朝完备，形成一整套戒律森严以解协饷为核心的制度。但19世纪40年代以降，此种静态的固定化的财政体系已不能适应急剧变动的时局，造成僵化的收入体系与动态的支出体系之间日益增大的脱节。首先是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开销及战后的条约赔款，成为清朝财政前所未有的额外开支；继之更有太平天国的发生，太平军的占领区恰好是清朝财税最重要来源地，使得解协饷制度被全盘打乱。大规模的战争使国库竭蹶，雍正年间，中央库存一般有六、七千万两银的盈余，到了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1853年7月17日），户部正项待支银的结存只有22.7万余两，国家度支“从未见窘迫情况竟有至于今日者”<sup>20</sup>。为免除国家的财政崩溃，无非开源节流两个招数，于是，一系列新财源在洋务运动前后相继确立。其中的大项有：厘金，渐次成为除地丁外的第二大税收；关税，成为第三大税源；还有外债、公债以及官办洋务企业的盈利的收入。其中除厘金外的各项收入已颇具近代税源的形态，“此在吾国经济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转变关键”<sup>21</sup>。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相沿已久的封建财政体制迈向近代财政体制的初步。行政制度：清朝行政体制的变动首先是在与外人密切接触部分发生，1850年代，中国初步确立了近代的海关制度，惜主要由外人操纵，即所谓的“洋关”。1860年代，清朝建立了“总理衙门”，此举标志着洋务运动的起步，意义殊大，《清会典》对该机构的职掌范围确定是：“掌各国盟约，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陆出入之赋，舟车互市之制，书币聘饗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译传达之事，民教交涉之端”。中国官僚机构的近代化从涉外机构起步，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终于，经过洋务运动等的酝酿生发，到1911年，中国出现了制度文明转换的大革命—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仅宣告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结束，而且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倾覆，宪法、国会、民国这些近代制度文明的产物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嗣后，共和成为中国人民确认不易的正统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向近代文明制度的转进上有了决定性的进步。

---

20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6页。

21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367—368页。